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效应研究

摘要：“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提出至今已过去了 15 年，前人就“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定性和定量研究，从产业结构、对外贸易、财政金融体系、收入分配、教育以及创新等给出了诸多方面的解释，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截至到目前为止，“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并未消失，也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以巴西、阿根廷为代表的广大中等收入国家依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与此同时，2021 年是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第 25 年，且当前我国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已极为接近，正处于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然而，距离高收入国家的目标越近，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风险、矛盾和压力也越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新视角出发，继续深入探讨“中等收入陷阱”背后的机理及其在新时代的表现和特征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中等收入国家来说，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试图另辟蹊径，从制度视角出发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约束条件与突破路径，因此对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演变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梳理，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启发新思路，寻找新方法，将制度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纳入到统一的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之中，为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约束与突破路径打下稳固的基础。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制度；人均国民收入；经济增长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作为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在国内外均有大量的研究基础，国内外学者们从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人口红利等多个角度进行了丰富的理论阐述和实证分析，但极少有研究从制度视角切入来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整体来看，当前学者对制度质量与经济表现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判断基本达成了共识，但从突破制度约束视角来解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还较为缺乏，“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所存在的具体制度约束及相应的突破路径仍需进一步探索。因此本部分主要从制度经济学理论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两个大的方面就现有研究进行综述。

一、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

（一）制度的概念界定

不同学科的学者们赋予了制度诸多的定义，当前关于制度的定义有将近 200 种^①。从通用的定义来看，《美国文化遗产大字典》和《韦伯斯特字典》指出：“制度就是行为规范”。类似的，《辞海》关于制度的定义为：“成员共同遵守的、按统一程序办事的规程”。马克思认为“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对于制度中的产权关系其理解为“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术语”^②；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凡勃伦曾提到说：“制度是一种思想习惯和流行的精神状态，它是人们对这类环境所产生的刺激做出反应后的一种惯性处理方式，而这些制度的发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社会的发展”^③；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说：“制度是一种行为准则”；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认为：“制度是一种行为模式”。

即使在经济学领域，不同经济学家出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对制度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如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种规则；制度如同一个框架，人与人之间在这个框架之下相互影响；制度从中确立起竞争与合作之间的联系，然后这些被确立起来的联系组成了一个社会，……所谓制度，就是一系列自动形成或被动制定出来的秩序、规则、伦理规范、行为道德，其目的是对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或者主体的福利进行约束和制约”^④。诺斯还指出，制度作为社会的游戏规则而存在，目的在于给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设定制约^⑤。他认为制度包括非正式的制度、正式的制度以及相应的实施特征。制度经济学派

^① 徐贻军、何德平，制度的笼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5-6。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③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39—140。

^④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226。

^⑤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

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康芒斯说：“制度是一种组织，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①；制度经济学派的霍奇森则指出：制度是在社会组织之下派生出的行为规范，受到法律、习俗以及传统的约束^②；青木昌彦等（2000）另辟蹊径地从博弈论视角总结了制度的三种类型，包括博弈的规则、博弈的参与者以及博弈的均衡解；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威廉姆森（1996）把制度划分为四个层次，首先是非正式制度，它嵌入于社会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习俗之中。其次是正式制度，如产权、法律、宪法等。接下来为在各种各样的具体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治理制度。最后则是在前三个层级之下的资源配置制度^③。瑟尔沃（2015）则指出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被定义为财产权的保护；法律和制度能够公平执行；政府保护个人免受经济冲击并提供社会保护，以及政治腐败的能力^④。

从制度的性质来看，制度可以分为不同种类，如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强制性的制度和非强制性的制度；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按照诺斯的观点，非正式制度包括道德规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正式制度包括契约、经济规则以及政治规则等。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聚焦于国家层面，因此更偏向于威廉姆森第二、三层级特别是第三层级中对制度的定义。即将制度定义为正式规则及其规则的实施和执行两部分主要内容，重点关注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构方面的制度问题以及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的相互协调。这里所关注的制度环境指直接或间接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及其相应的执法、司法条件，本文使用统一的衡量指标来进行国别之间的制度质量比较。

（二）制度经济学的发展

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经济行为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如制度如何影响经济行为，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如何反作用于制度以及制度的演变。正如黄少安（2017）提到的那样，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自身如何生成和演进，另一方面是制度如何作用于经济活动并造成相应的结果，如制度如何影响个体选择、收入分配以及经济增长等。制度学派并不是一个划分十分严格的经济学派，整体来看，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非常之广，只要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都可以归入到制度经济学之中。制度经济学派内部的观点不甚统一，其发展脉络与经济

^①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87-89。

^② 转引自张宇燕：“制度经济学：异端的见解”[A]，《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6-228页。

^③ Williamson Oliver E. 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M]. Oxford c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④ A.P.瑟尔沃，发展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07。

学的发展规律相一致，在不同时期和发展阶段，制度的研究范畴、方法论、解释逻辑乃至被重视的程度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学家们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对除制度因素之外的历史因素、法律因素、伦理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非市场因素的分析，强调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制度经济学家们把经济活动看作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要素构成的有机体，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制度主义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对经济活动的衡量并不通过任何一个客观指标进行，而是基于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认识和理解经济活动。

一百多年来，制度经济学一直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研究分支而存在。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始于沃尔顿-汉密尔顿(Walton Hamilton)，他在1918年第31届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提出了“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分析方法”，并将其发表于1919年第1期的《美国经济评论》上，题为《对经济理论的制度处理方法》^①。但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私有制的抨击与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制度的宏观经济解释以及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学家对经济体制改革所做的探索都可以被纳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来。到目前为止，制度经济学仍旧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研究范式，各种学术流派都被包含在制度经济学的阵营之中。本文在下面对制度经济学发展脉络的分析中，依旧当前较为普遍的分类方式，主要将制度经济学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三大类展开分析。

1. 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经济学

马克思(1972)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对制度的起源及发展进行了阐释。他从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努力带来的生产力的进步出发推测了制度起源的第一个阶段，即制度是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基于这种生产关系，马克思又从不同利益集团和阶级矛盾中得出制度起源和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上层建筑，它包含了到的习惯、法律法规、政治制度等。同时马克思提出制度来源于物质生活的观点，而这种生活的本质是交往，因此交往的扩大是制度形成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提出了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等制度来源于物质生活的制度起源说。针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常见的制度术语产权制度来说，马克思认为产权这种制度仍然是来自于生产领域，他指出产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因为自己的商品往往只能靠劳动创造，让渡自己拥有的商品是占有别人商品

^① 详见：Hamilton, Walton H., 1919,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 (1) :309-318。

的唯一手段，因此，在该过程中互相对立的只不过是拥有平等权利的商品所有者而已^①。

随后，恩格斯（1995）通过分析国家和制度的起源进一步补充了马克思的观点，他提出国家是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社会产物，如果要对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进行约束，就需要一种高于社会的力量，这种力量产生于社会、活跃于社会并且日益从社会中异化出来，它就是国家^②。恩格斯的这个论断科学地指出了国家和制度的起源，该背后的逻辑在于，随着生产的扩大，人们在其相互交往中势必发生冲突。为了保持发展，就需要合作谈判把冲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就需要秩序和规则，随之也就产生了制度。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制度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随之带来的社会交往的扩大而产生的，这种扩大的交往需要人们普遍认可的一系列的行为规则来维系，这些规则逐步地演化就成为了制度^③。从马克思主义的制度观来看，制度是为维系人们的交往而形成的规则，并随着交往的扩大而逐步成熟，生产力发展则使交往的扩大成为一种必然，可以说是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带来的交往的扩大最终导致了制度的产生。

在制度演进的方式上，马克思（1972）认为制度变迁（表现为社会形态的演进）的真实原因是原有的制度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从而导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带来生产关系（也即制度）的变革与发展。因此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变迁（制度演进）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生产力的张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理论解释了制度演进的一般规律，当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时，以制度为代表的上层建筑就会发生变迁与演进。人类历史上不同的社会制度模式，实际上就是与一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组织、文化习俗和法律法规的上层建筑。

马克思对制度及制度演进的分析与解释为制度经济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决定了制度的演进和社会变革的理论是根本性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家关于交往的扩大以及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带来对制度的需求并进一步导致制度变迁的理论，最终归根结底还是走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的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制度起源和变革这一方向。诺斯（2002）也曾指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0。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0。

^③ 张勇，制度的定义和作用及其对发展的意义——兼论马克思的制度观与发展观[J]，经济学家，2015年第4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0。

马克思对制度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指出,马克思理论的分析框架对制度变迁理论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因为它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意识形态、国家、产权、制度等要素包括进来,该分析框架目前来看也是最有说服力的^①。

2. 旧制度经济学

旧制度经济学(The 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产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制度经济学曾一跃发展成为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派强调制度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注重从制度发展的视角对制度变迁和制度结构进行论述。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即旧制度经济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规范,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没有做出严格的定义,不同制度主义学者虽然都倡导将制度分析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来,但彼此之间的研究方法甚至是研究观点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众多,包括提出制度演化理论和所谓“技术决定论”的凡勃仑(Veblen),提出“商业循环论”的密契尔(Mitchell),提出“法律调和论”的康芒斯(Commons),提出“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的缪尔达尔(Myrdal),提出“国家干预论”、“技术发展必然性”理论和“抗衡力量”理论的加尔布雷斯(Galbraith)。在这些代表人物中,凡勃仑和康芒斯被视为制度经济学的鼻祖。密契尔则凭借其对经济周期及其统计论证的研究成为经验学派的奠基者。整体来看,旧制度经济学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展开,多揭露和批判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缺陷。各种社会控制问题是当时的研究的重点,主要关注包括社会规范和社会组织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塑造、管制和约束过程,研究的热点集中于社会规范、道德、习俗等非正式制度以及合同、产权、竞争、破产、劳动立法等各种各样的正式法律制度,也会涉及到对经济发展的外部性、社会保障、反周期经济政策等经济现象的考察。这些都曾成为旧制度经济学当时的研究热点与研究重点。

在方法论上,旧制度经济学多为定性研究,主要采用的是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和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并辅以演化分析、归纳分析以及行为主义分析方法。旧制度经济学同时也特别强调实证主义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的理论形式和模型建构方面较为松散,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规范。黄凯南和程臻宇(2018)对旧制度经济学发展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梳理并指出:首先,旧制度经济学将制度作为研究的重点,关注制度变革的过程,侧重于解释在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制

^① 道格拉斯·诺斯,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 年第 5 期。

度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将影响制度变迁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纳入其考察范围；其次，旧制度经济学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一些抽象的假设，吸收了许多其他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如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将对旧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放于多学科交叉的显示研究背景之下；最后，旧制度经济学家们强调研究要面向现实世界，不拘泥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和模型推导，强调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来分析现实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旧制度经济学凭借这种相对科学的研究方法，直面社会重要问题，并将其研究用于分析和解决相关社会控制空题，一度成为主流经济学阵营中的重要成员，甚至被视为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加先进的理论。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以及新古典经济学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由于旧制度经济学无法用规范和定量的数学模型来揭示事物的内部规律，经济学家们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热情急速下降，旧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遭遇寒流。然而，旧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并未就此止步，随着研究手段的更新以及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一直专注于旧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在继承其结构主义、传统演化主义以及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有用的研究理念和分析工具，开始使用更加规范化、数学化和实验化、模拟化的研究方法，使其研究方式和理论推理都更加的严谨和科学。一些早先研究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也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制度主义分析。

3. 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由旧制度经济学发展而来，虽然同样将制度作为其研究对象，但与老制度经济学所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发源于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范式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内核，但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又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拓展和修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解释和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而逐渐衰落，经济学家们开始再度重视起制度对于经济运行的重要性，对制度研究的热情再度被重拾起来。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性质》一文，新制度经济学以该文为基础发展起来。威廉姆森最早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一词，其主要代表人文有诺思(North)、科斯(Coase)、阿尔钦(Alchian)、威廉姆森(Williamson)、施蒂格勒(Stigler)、巴泽尔(Barzel)和和张五常(Steven)等。

从研究对象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通过弱化新古典经济学某些远离现实的假设，主张采用演进的方法、结构分析的方法将制

度纳入经济分析之中。在研究的假设上，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经济人在活动中具有机会主义倾向而非完全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理性选择模型和稳定性偏好的假设。新制度经济学仍然在理性选择的框架下来研究产权、契约、法律、政府管制等制度的形成、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早期的旧制度经济学忽视对交易费用和产权的研究，侧重于对经济历史的分析（张五常，2008），新制度经济学则侧重于研究制度结构、交易成本、产权理论、政府行为干预等，并在研究过程中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使制度经济学研究更加接近现实。旧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体系是制度结构，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核心则更侧重于资源配置制度。和以前的制度分析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新制度经济学引入了边际分析，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将制度作为一个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引入到经济学分析中。科斯之后，在在引入交易成本的基础上，有关资源配置效率的众多理论和实证研究被展开。

当前，新制度经济学尚未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科学体系，其研究主要针对一下四个方面展开。一是交易费用理论，由科斯提出，后经威廉姆森等学者的研究而逐渐完善。交易费用/成本理论主要研究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它提出并论证了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交易体制，即企业与市场的二分法。该理论被视为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该理论认为，在有限理性的假设之下，企业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交易机制，正的交易费用的存在把交易成本明确地引进了经济分析之中，法律、产权、制度等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外部性、垄断、价格粘性、垂直一体化等涉及到交易费用的问题都被引入到该分析之中，并影响着经济系统的整体运行。二是产权理论。该理论认为，产权的本质在于使外部性内在化。当内在化的成本低于内在化的收益时，外部不经济问题可以通过对产权进行清晰地界定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搭便车”和“外部性”问题发生的主要根源在于产权界定的不清晰。三是契约理论。该理论主要研究在特定的交易环境下，行为人不同的经济行为与最终结果之间的互动关系，可划分为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该理论的研究重点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和行为人之间利益的冲突，作为要素所有者之间的纽带，企业产权配置的核心应是确定企业的所有权。该理论在委托代理、企业理论中使用较广。第四是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诺思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结合起来，认为制度变迁是指对制度框架的创新和被打破。制度变迁发生与否在于潜在收益和潜在成本的动态变化，是对制度均衡的动态寻找，它既

包括在基本制度不变前提下具体运行的体制模式的转换,也包括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也可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早期重要的研究主题是制度比较和制度选择,随着其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交易费用经济学、采购理论、关键资源理论、财产权利学等研究逐渐展开。整体来看,早期学者如科斯、施蒂格勒、德姆塞茨、张五常等对其做出了突出贡献,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及其引入的边际分析方法为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当前发展来看,除了制度变迁理论、国家理论等主流分析之外,新制度经济学也关注对前沿问题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目前关注的前沿问题包括:互惠制度的形成(制度的微观研究)、演化制度分析(制度是无数互助的个体行动无意识的结果)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等。近年来,制度经济学逐渐将博弈论纳入其理论体系,博弈论成为制度分析的重要工具,并迅速成为制度分析的主流范式^①。以霍奇逊等为代表的学者随着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开始倡导在恢复旧制度学派传统的基础上,引入“通用达尔文主义”^②。还有一些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观点为基础,试图去考察技术创新和制度演化的内在互动机制,研究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③。一些学者还将制度的研究扩展到与偏好、文化等多层级互动的视角^④。这些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新制度经济学不断向前发展。

(三)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改革开放和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这 70 多年的制度变迁及其恢弘巨变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数据和资料。特别是制度经济学,虽然其发源于西方,但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整体来看,中国的学者就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应用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或某一类经济学现象,多属于应用性研究,当然,也有少数知名经济学家就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演变展开论述。

在理论分析方面,张五常率先将新制度分析系统地运用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张五常(1969)便将产权制度的分析方法应用在台湾的

^① Binmore, K. (2010). Game theory and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8(3), 245-252.

^② Hodgson, G. M., & Knudsen, T. (2012). Agreeing on generalised Darwinism: a response to Pavel Pelikan.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2(1), 9-18.

^③ Murmann, J P. *Knowledg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co-evolution of Firms'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④ Samuel Bowles, Sandra Polania-Reyes.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Social Preferences: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12.

土地改革上并创立了“新租佃理论”（即佃农理论），随后他以纯粹的制度分析，就中国的金融改革、城市企业改革、农业改革、住房改革以及腐败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论点。20世纪80年代以后，张五常更是完全献身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分析、政策建议，对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①。林毅夫（2005）^②通过“费用——效益”的经典理论构架来分析制度变迁，他将制度变迁划分为两种，即国家为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而通过政策法规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人们在制度失衡时追求潜在盈利机会的自发变革（诱导性变迁）。除制度变迁理论以外，林毅夫还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中国的国企改革问题（林毅夫，2019）、发展战略问题（林毅夫，2010）、农村土地改革（林毅夫，2006）、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林毅夫，1988）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应用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以制度经济学为研究基础，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叶敬忠、王丹（2019）在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下分析了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问题；易绵阳（2014）基于交易费用视角比较了南京政府时期的行政化监管制度和北京政府时期的市场化监管制度，并详细分析了这两种金融监管制度对近代中国国民经济的影响；胡彦宇、吴之雄（2011）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对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制度障碍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和实证分析；丰雷（2018）则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对中国农地制度变迁进行了回顾与展望；邵学峰、任春杨（2016）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视角，研究了中国自由贸易区外商投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认为其存在路径依赖，应采取措施予以优化；周敏等（2014）同样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建构了大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动力机制的解释框架；刘承礼（2009）则对当代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进行了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探讨了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拟合程度和政府行为的变迁路径；卢现祥、朱迪（2018）和龚三乐、王胤奎（2020）则对中国长时间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在改革开放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思想理论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我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学习、研究和运用的指导原则，该阶段对西方的一些经济学理论主要持批判态度。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幅度地翻译和引入了一批西方经济学著作，制度经济学也位列其中，但主要以比较制度经济学为主，相关研究也多侧重于对不同经济制度的比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

^① 张五常的代表性作品包括《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等。

^② 林毅夫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382-398.

国出版和引进了许多新制度经济学的专著，中国学者就此也展开了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系统研究。总的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发展传播的高峰时期与我国改革过程中亟需理论指导的发展时期是重合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中国的改革实践形成了基于各自需求的良性互动局面。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传播为我国改革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中国独特的发展实践和制度改革也为新制度经济学内容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充实的素材。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虽然我国的经济学者基于制度经济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部分属于应用性研究，对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拓展和深入分析的文章目前仍旧较为缺乏，这也是我国制度经济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当前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只有推进持续的制度改革才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既是制度演进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一般机制，也是马克思制度观的根本要求^①。

二、“中等收入陷阱”研究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界定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初由世界银行提出。2006 年出版的关于东亚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疲软（East Asian Cities: Innovation for Growth）的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增速既不如富国，也不如穷国。中等收入国家如要繁荣，必须采取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措施”^②，但这一报告没有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2007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一词^③。该《报告》援引 Garrett (2004) 的研究，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同时面临着来自低工资穷国的竞争和高收入富国在技术和成熟产业的挤压，国家收入增长在两端国家的竞争下更容易变慢。亚洲发展银行在一份报告中也指出中等收入国家无论是在高新技术产业与高收入经济体竞争，还是在出口制造业上与低收入竞争都不具有竞争力，经济增长很难实现从劳动、资本的资源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发展和转型，因此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④。2015 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篇名为《The Middle-Income Trap Turns Ten》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中

^① 张勇，制度的定义和作用及其对发展的意义——兼论马克思的制度观与发展观[J]，经济学家，2015 年第 4 期。

^② 详见：Yusuf, S., and Kaoru, N. (2006). Postindustrial East Asian Cities: Innovation for Grow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③ 详见：Gill I, Kharas H & Bhattasali, D.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J].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7, 22(2):57-59.

^④ Kohli, H. S., Sharma, A., & Sood, A. (Eds.). Asia 2050: 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Z].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1:4-15.

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最初只是一种指导已经处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政府如何加速改革，走出经济发展停滞的政策工具。该词随后在使用中逐渐被广泛用于描述那些由于糟糕的政策而导致中等收入国家增长放缓并在短期内难以改善的情况。总的来看，“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指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在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时，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或徘徊，从而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现象。

“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之后，不同学者也从中提炼或引申出不同含义。Eichengreen 等(2012, 2013)和 Aiyar 等(2013)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指出，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甚至停滞，人均收入长期无法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就被视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Ye 和 Robertson(2016)从经济停滞的角度研究指出，如果一国与美国人均收入之比长期趋于平稳，且这一经济体长期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组，就说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外学者 Spence(2011)、Kharas 和 Kohli(2011)、Egawa(2013)、Islam(2014)、Kumagai(2014)、Vivarelli(2014)、Yilmaz(2014)等也都就“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与此同时，一些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就该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详见 Jimenez 等, 2012; Gill 和 Raiser, 2012; Robertson 和 Ye, 2013; Koen 等, 2013; UN, 2013; Agenor 和 Canuto, 2014; Flaaen 等, 2014; Bulman 等, 2017; Jankowska et al., 2012; Fraser-Moleketi, 2015; Bogumil 和 Wielądek, 2014 等。总体来看，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的研究，都将“中等收入陷阱”视为中等收入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遭遇的一种经济现象，即当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是约在 4000 美元到 10000 美元左右），国家发展同时受到来自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两面的挤压，经济增长的后续动力不足，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困难，加之国家前期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集中爆发，使得一国难以在短时间内迈入高收入国家而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大多数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持认同的态度，如蔡昉（2011）认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统计学的层面上具有较为普遍的显著性，从全球国家的发展实践来看也有充分的经验证据，而且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可以用来分析特定阶段的经济发展现象，具有深入研究和讨论的意义。郑秉文（2011）也认为，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实践来看，拉丁美洲、中东与北非、欧洲与中亚的一些国家确实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了较长

的时间,即存在着国家跨越低水平均衡陷阱后长期徘徊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现象。胡鞍钢则(2010)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值得惊讶的社会经济现象,发达国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较为普遍的一个发展现象。Kharas 和 Kohli(2011)的研究指出,虽然“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所有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会落入的一种经济现象,但从国家经济发展轨迹来看,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极少数经济体能够躲避过去。贾康和苏京春(2015)在其研究中也明确指出,无论是从国别历史考察还是从统计数据来看,“中等收入陷阱”都是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真问题”。厉以宁(2012)认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明确存在,且包含着“发展的制度陷阱”、“社会危机陷阱”和“技术陷阱”这三个陷阱。杜曙光和刘刚(2013)也指出,探寻“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经济学基础已经成为研究的必然趋势,有必要在现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挖掘。

也有一些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本身是否存在持怀疑的态度,认为把一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所有问题都纳入到“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下进行讨论有“教条化”和“标签化”的嫌疑。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些学者指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不过是描述经济发展困境和经济增长习惯称谓的自然延续。如江时学(2013)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本身是狭窄的,当前研究有将其曲解和扩容的嫌疑,片面的将人均收入能否超过一定数值作为跨越与否的标准是不科学的,因此而得出的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华生和汲铮(2015)的研究指出当前“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较为模糊,从比较意义的层面来看,“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存在的,赶超意义层面的“中等收入陷阱”也存在明显缺陷,停滞角度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就是中等收入阶段。范和生和唐惠敏(2015)更是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不过是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消解矛盾时的一种正常状态,过分强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会使国家发展陷入自我实现的怪圈。Felipe 等(2014)也否定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认为应使用中等收入阶段转型这一表述替代“中等收入陷阱”。Barro(2016)依据条件收敛率进行了实证检验,也并未发现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收敛要难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收敛。

总的来看,学界对中等收入陷阱内涵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的视角,虽然定性层面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不统一且存在较大争议,但学者们基本上也达成了一

种共识。“中等收入陷阱”被认为是一个容易导致发展路径出现分化的阶段，是经济运行容易发生变化的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从本文的研究角度出发来看，“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更多是一种对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缺乏认识的“陷阱”。正如 Gill 和 Kharas（2015）在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反思时所指出的那样，学者们用内生增长理论来解释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现象，用索洛模型来理解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但对于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来说，以上两种经济增长理论都不能够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从这个层面来讲，“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特指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也非承认中等收入国家比其它国家更容易进入“陷阱”，而是指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理论来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导和信息，是一个可能会困住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将“中等收入陷阱”视为一种经济发展现象，而非必然规律，其主要作用在于引发人们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政策选择进行讨论的工具而存在，而非强调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低增长率的决定论。对该问题的探讨更多是为了给中等收入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

自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以来，由于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国内外学者就该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这些研究既包括定性的“中等收入陷阱”发展理论研究、跨越动力与机制研究、诱因与对策路径研究，也包括“中等收入陷阱”判定标准及测度方法研究、影响因素研究等实证分析。根据学者们研究视角的不同，本部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

1. “中等收入陷阱”判定标准及测度方法研究

要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界定首先需要对“中等收入”这一概念进行明确，当前主要有相对收入法和绝对收入法两种标准^①。绝对收入法根据全球国家的人均收入分布来划分不同收入水平区间，如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高收入阶段等，然后依据各个国家和经济体所处的收入水平区间位置将其定义为不同收入阶段的国家。当前使用最多的绝对收入法是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世界银行将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经济体划分为高收入国家（H）、上中等收入国家（UM）、下中等收入国家（LM）和低收入国家（L）四类，其每年都会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

^① 详见：韩平、梁谱，“中等收入陷阱”的判定标准及测度方法：一个综述，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

况对各输入水平的分类标准进行调整。相对收入法是以美国或经济合作组织成员（OECD）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为标准，然后将不同国家或经济体按照同一标准衡量的人均收入与参考对象的人均收入进行对比，以其占参考对象比值的不同来进行各收入阶段的划分。从现有研究来看，相对收入法的应用由于依据高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水平，追赶高收入国家的含义较为明显，且划分出来的收入组别极不稳定和均匀，目前多用于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或收入阶段的收敛性，在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测度和界定时使用的并不多。目前使用最多的还是在世界银行每年公布的收入阶段门槛值基础上进行界定和判断。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判定标准及测度，目前主要有 3 种方法，一是依据“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来进行测度。学者们选择那些公认的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拉美和中东国家，通过研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来提取并构建相应的测度体系。如高源（2010）研究发现，“中等收入陷阱”陷入国家基本上都有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金融体系脆弱、过度城市化、贫富分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腐败多发等问题；胡鞍钢（2010）在对“中等收入陷阱”陷入国家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总结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大特征；二是凭借一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滞留时间长短以及在该阶段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来判断。Felipe 等（2012）计算了那些公认的已经进入高收入水平国家在中等收入水平的滞留时间，并选取了其中的中位数作为了判定标准，得出对于刚开始进入“下中等”收入的国家，若其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的期限为 28 以上则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对于已经进入“中高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来说，这个时间缩短为 14 年；韩文龙等（2015）在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分析时，使用“国际元”折算的方法将汇率波动的影响纳入计算，经过研究后发现，刚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要想摆脱下中等收入阶段和上中等收入阶段，人均收入增长率至少分别要 5.2% 和 3.2%。三是凭借人均收入能否收敛来进行测度。该方法基于经济趋同理论，若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不能收敛于高收入国家，则该中等收入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Rosenblatt 等（2013）发现在不同收入阶段国家中，只有零星几个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没有出现扩大的迹象，但只要高收入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1.8%，那么即使中等收入国家能够维持过去 30 年的经济增速，也很难在半个世纪内以向发达国家收敛；Woo（2012）使用相对收入法，以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作为参考标准，计算了其它国家人均收入占美国人均收入的百分比，将处于美国人均收入水平在 20% 和 55% 之间的国家视为处于中等收入水平或阶段，然后考察

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停留时长,将长时间没有向美国收敛的国家和经济体视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内学者林志帆(2014)同样在经济增长收敛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条件收敛增长模型,通过对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他发现中低收入国家更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β 条件收敛在全球范围内显著成立,随着经济增速的提升,无论是要素积累还是收敛系数都经济增长速度的促进作用都呈现出降低的趋势。在考虑异质性之后,模型识别结果与经验事实仍高度相符。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使用增长率如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来测量和界定“中等收入陷阱”,如张德荣和朱翔宇(2013)就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角度,使用TFPG核算框架测度了“中等收入陷阱”。总体来讲,学者们看待和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和切入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内外的学者们对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界定和识别进行了许多创新性的研究。但目前并没有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较为统一或者公认的测度方法,已有的几种测度方法在使用过程中也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从已有研究来看,一个有信服力的测度方法或判断标准应具有时效性、包容性和适用性的特点,当前文献为我们开展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未来对“中等收入陷阱”判定标准及测度方法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2. “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与对策研究

对“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陷入原因进行分析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从收入差距、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福利制度等多个方面展开了研究。龙莹(2012)通过对中国微观数据的研究发现,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加深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与壮大起着较大的阻碍作用。蔡昉和王美艳(2014)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的恶化与经济发展停滞之间存在着互相强化和互为因果的关系,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也会增大,应重视收入分配状态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周文等(2017)的研究认为,收入分配公平、收入差距小能有效促进经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陶振全(2017)的研究则表明,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产业结构的失衡、过度城市化以及贫富差距悬殊虽然都是拉美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但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才是其跨越失败的根源。

对国际数据的研究也发现,创新能力是影响一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企业的科技研发活动能够极大提高一国的产业竞争力,创新能力不足或薄弱的国家步入高收入国家会更加困难。Eichengreen(2012)发现,当一

国人均收入水平处于接近高收入门槛值时,其经济发展出现增速放缓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放缓。王一鸣(2018)的研究指出,韩国和巴西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的差异化结果源于这两个国家的创新体系建设,企业研发机构通过影响科技研发能力转变间接影响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孙振清等(2018)从专利技术的研究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专利申请数量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关系,研究发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有更多的专利申请,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张欢等(2018)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的质量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增长,并且高等教育的质量越高,其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经济增长的趋势就越明显。郭熙保和朱兰(2017)基于 K-M 估计量和转型概率的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出口结构和人力资本对中等收入的转型概率有显著性的影响,其中尤以人力资本的影响最为突出。

国外学者 Glawe 和 Wagner (2016)、Agénor (2017) 系统梳理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现状。Hausman (2006)、Yusuf 和 Nabeshima (2009) 以及 Bloom 等 (1998) 也从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红利等角度对影响“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其他与“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相关的影响因素包括工业结构转型 (Ohno, 2009; Eichengreen, 2011; Aoki, 2011; Bulman 等, 2017; Agénor 和 Canuto, 2015)、对国外技术的模仿和比较优势 (Acemoglu 等, 2006; Felipe 等, 2012; Dabús 等, 2016)、人力资本等 (Jimenez 等, 2012; Jitsuchon, 2012; Eichengreen 等, 2013; Agénor 和 Canuto, 2015)。

针对以上诱因,学者们也给出了相应的具体路径选择,如刘伟(2011)认为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微观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和宏观经济调控方式的变化都会对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产生重大影响。王一鸣(2011)的研究则认为错失发展模式的转换时机,无法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体制变革滞后和收入分配不公等方面给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失败的原因。蔡昉(2008)则指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一大挑战,加强就业与公平效率的统一,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是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手段。马晓河(2011)通过对巴西、韩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在中等收入转型过程中经验教训的考察,提出结构转型,特别是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能否顺利及时地实现调整和升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李炳炎(2012)则认为,对于中国而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收

入分配改革，以民生为导向，以初次分配为切入口理顺利益分享关系是我国能够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保障。温桂荣等（2021）通过构建 43 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初高级人力资本均能显著促进国家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结构优化能够有效助力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吴笛（2022）利用国别数据，实证检验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消费结构的升级能够促进一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从而助力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技术创新、融资约束、对外开放、微观企业改革等方面给出了应对策略，如张德荣（2013）基于实证研究框架，研究了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和固定资本形成率是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共同动力因素，原创性技术的进步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丁一兵等（2014）利用中等收入国家行业层次的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运用多种估计方法实证考察了影响“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的重要因素。其研究最后表明，融资约束通过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影响着“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其中特定领域金融改革，金融部门效率的提高、规模的扩张等放松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表现对于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具有重要促进作用。龚刚等（2017）基于转移概率矩阵，对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机制和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后发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他们依靠自主研发所获得的技术增长率是否能够超过前沿国家。代法涛（2014）采用多种计量方法对 44 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进行了跨国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投资、消费和技术对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济增长发挥了明显的拉动作用；高抚养比、政府支出和通货膨胀则对“中等收入陷阱”陷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且技术进步对“中等收入陷阱”陷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没有产生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三）制度对国家收入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

在宏观层面上，科斯和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将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致力于探究制度与经济总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诺斯和托马斯（1973）认为：对经济增长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而制度因素中的产权又在诸多构成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因素中发挥着最为突出的作用。

他们进一步指出,西方工业革命的发生乃至后来西方国家的兴起并不是源自技术的革新,而应当从所有权以及社会制度的变迁中寻求原因。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①。当前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别分析,即对某一时期不同国家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另一方面是对单一国家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本文重点关注第二方面的相关研究。

Acemoglu 等人(2001)以不同的殖民经历作为制度外生变量的研究发现过去的死亡率和现在的制度质量之间以及过去的死亡率和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均存在强烈的负相关。Knack 和 Keefer(1997)的实证研究表明,穷国追赶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经济活动所处的制度环境。Chong 和 Calderón(2000)的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越是贫穷,且等待时间越长,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会越大。

国内学者对国家收入差距与制度差异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分析。黄新飞等(2013)从异质性的角度分析了跨国收入差距和制度距离的关系,在对全球 146 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制度执行等方面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控制了语言宗教、地理因素、人力资本和共同信仰等后,制度差异能够显著影响国家间的收入差距。陶长琪和彭永樟(2018)同样分析了制度视角下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内在路径,通过对西部、中部和东部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作用的考察,作者提出保障创新驱动效应的重要前提是制度质量,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内在路径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次序。程强(2019)对 2004—2015 年间五十个国家的 SEM 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和市场化制度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通过制度影响一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夏勇等(2021)采用混合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 2005—2018 年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明显促进作用的因素有:产业结构、社会消费品总额、物质资本存量、非国有经济发展度、教育经费收入等;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的经济因素有:专利申请受理数量、城镇总就业人数和就业人数。

也有学者从“中等收入陷阱”角度出发,将制度建设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解决方法进行分析。郑秉文(2011)提出,制度影响着一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动力组合,该动力组合在极大程度上决定或影响着一国能否顺利跨越“中

^① 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1973):《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 年中文版

等收入陷阱”。孙立平（2012）研究发现，一国因制度固化引起的社会矛盾会不断积累，并扭曲经济主体关系，从而使得国家转型困难，进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张德荣（2013）的研究也表明，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发展阶段，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对外开放战略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到了中高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以后，要素积累对一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开始下降，制度和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分工和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看，政府治理水平有可能成为一国是否被“中等收入先陷阱”锁定的决定性因素。田国强和陈旭东（2015）指出，制度转型困境才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本质，政府治理和治理体系跟不上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会带来社会失范、政府失灵、市场扭曲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使国家在转型途中长期滞留，国家进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张军扩等（2019 年）的研究表明，制度质量的高低确实会影响到“中等收入陷阱”，应从制度建设方面入手来促进“中等收入陷阱”跨越。已有分析也有从制度的某一方面入手展开论述，如户籍制度（都阳等，2014）、国际制度（郑宇，2016）、收入分配制度（郝会凌，2020）、产权制度（白暴力和王潇锐，2016）或制度的某一特性，如制度公平性（王学龙、袁易明，2015）等分析“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整体来看，以上研究都聚焦在了制度的宏观层面之上，与本文得研究内容存在共通之处。

三、小结

经济界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比较热烈，有争论也有共识。综合来看，目前学者们对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与应用，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解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近年来，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优秀成果，但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文章少之又少，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主流理论模型并没有将制度的作用纳入分析框架。一些制度经济学的学者分析了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试图量化，但由于数据和方法的局限，这些分析往往长于定性研究以及对国家和地区的测度，短于制度的定量和国别研究，制度影响国家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和实证检验更显不足。目前已有的关于国家经济增长与制度质量的研究文献中，随着对制度作用认识的不断加深，国内外的学者在原有的理论分析基础之上，近年来开始通过构建模型对制度与国家收入差距进行大量的实证分析。虽然目前学者们对于制度的测度和衡量尚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数据，但在进行了大量的定量分析和国别比较分析之后，基本认为制度质量与国家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

整体来看，国内学者当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仍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且主要聚焦于对“中等收入陷阱”诱因与应对策略的分析，系统性的研究制度与“中等收入陷阱”关系的文章较少，为数不多的实证文章主要是将制度作为影响国家收入差距的因素之一，着重探讨制度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和制度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发挥的作用，但从制度入手来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章很少。在一些定性分析的文章中，也多是单从制度的某一方面分析入手，或是很宏观的将制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并未对制度进行分类和量化，也未关注制度本身的抽象性、系统性和复杂性。利用时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且缺少严谨的机制分析、理论解释以及实证检验。本文在整合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制度因素对国家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多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之上，如追赶红利逐渐消失的阶段，经济增长结构转换阶段或是中等收入阶段，而“中等收入陷阱”本身也是一国在摆脱经济贫困、实现快速发展之后，在向更高收入阶段迈进时可能会遭遇到的一种经济现象，二者的作用区间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这表明制度因素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很可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本文致力于将制度安排引入一国经济增长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框架，分析制度质量与关键制度要素如何影响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发展过程，侧重于对跨越国家和停留国家上中等收入阶段的分析。在具体操作方面，本文利用全球主要中等收入国家的面板数据，从历史和国际视角综合考察经济增长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并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制度要素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并予以量化，系统性地探讨“中等收入陷阱”与制度的关系。此外，本文还将其运用于中国的发展实践，引入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制度发展情况的分析。本研究努力的方向之一就是通过本文的研究增进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理解以及中国发展模式的剖析，力求为理解中国独特的制度变革和发展模式及中等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提供理论制度支持。

参考文献

- [1] 奥尔森著, 苏长和译, 权力与繁荣[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3. [2] 龚三乐, 王胤奎.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变迁[J]. 上海经济研究, 2020(09): 19-30.
- [3] 郝会凌. 我国收入分配政策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基于个人所得税视角[J]. 西南金融, 2020(03): 68-78.
- [4] 蔡昉. 从中等收入陷阱到门槛效应[J]. 经济学动态, 2019(11): 3-14.
- [5] 魏熙晔, 龚刚, 李梦雨. 收入分配、产业升级与中等收入陷阱[J]. 浙江社会科学, 2019(10): 62-74+158.
- [6] 张建华, 程文. 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03): 39-61+205.
- [7] 叶敬忠, 王丹. 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农政问题及农政变迁[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6(01): 5-15.
- [8]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国有企业改革[J]. 社会科学战线, 2019(01): 41-48+2.
- [9] 谢伏瞻, 马建堂, 洪银兴, 江小涓, 逢锦聚, 韩保江, 姚树洁, 简新华.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笔谈[J]. 经济研究, 2021, 56(06): 4-39.
- [10] 赖伟伟. “中等收入陷阱”的测度——一个文献综述[J]. 金融经济, 2018(22): 98-99.
- [11] 黄凯南, 程臻宇.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前沿理论展望[J]. 南方经济, 2018(11): 15-26.
- [12] 卢现祥, 朱迪. 中国制度变迁 40 年: 回顾与展望——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J]. 人文杂志, 2018(10): 13-20.
- [13] 孙振清, 刘建雅, 兰梓睿, 边敏杰.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潜力研究——专利技术视角[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9, 36(01): 18-27.
- [14] 张欢, 徐康宁, 孙文远. 城镇化、教育质量与中等收入陷阱——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 35(05): 40-58.
- [15] 王一鸣. 跨越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企业研发机构——以韩国和巴西为例[J]. 科学管理研究, 2018, 36(02): 101-104.
- [16] 韩平, 梁谱. “中等收入陷阱”的判定标准及测度方法: 一个综述[J]. 哈尔滨

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1):85-93.

- [17] 郭熙保, 朱兰. 中等收入转型概率与动力因素: 基于生存模型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7, 34(10):23-42.
- [18] 龚刚, 魏熙晔, 杨先明, 赵亮亮. 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08):61-86+205.
- [19] 王丽莉, 文一. 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基于工业化路径的跨国比较[J]. 经济评论, 2017(03):31-69.
- [20] 郭凯明, 颜色. 生育率选择、不平等与中等收入陷阱[J]. 经济学(季刊), 2017, 16(03):921-940.
- [21] 徐永慧, 李月.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及比较[J]. 世界经济研究, 2017(02):88-98+136-137.
- [22] 周文, 赵果庆, 徐波.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突破与政策应对——基于地区收入差距视角[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7(01):26-38.
- [23] 黄少安. 制度经济学由来与现状解构[J]. 改革, 2017(01):132-144.
- [24] 姜文辉. 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经验与教训[J]. 亚太经济, 2016(06):92-98.
- [25] 郭熙保, 朱兰. “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吗?——基于统一增长理论与转移概率矩阵的考察[J]. 经济学动态, 2016(10):139-154.
- [26] 郑宇. 中等收入国家的国际制度“陷阱”[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6(07):131-155+160.
- [27] 胡鞍钢, 任皓, 鲁钰锋, 周绍杰.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1(05):62-73+194.
- [28] 吴昊, 林伟. 收入差距、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的城镇化道路[J]. 人口学刊, 2016, 38(03):106-111.
- [29] 白暴力, 王潇锐. 中等收入陷阱的产权制度分析[J]. 学术研究, 2016(03):100-105+178.
- [30] 陈昌兵, 张平.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事实及政策选择[J]. 经济学动态, 2016(03):43-55.
- [31] 王学龙, 袁易明. 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制度公平和人力资本的视角[J]. 经济评论, 2015(06):3-16.
- [32] 韩文龙, 李梦凡, 谢璐. “中等收入陷阱”: 基于国际经验数据的描述与测度[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11):160-168.
- [33] 华生, 汲铮.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阶段[J]. 经济学动态, 2015(07):4-13.

- [34] 林山君, 孙祁祥. 人口老龄化、现收现付制与中等收入陷阱[J]. 金融研究, 2015(06):48-63.
- [35] 田国强, 陈旭东.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制度转型和国家治理的视角[J]. 学术月刊, 2015, 47(05):18-27.
- [36] 张勇. 制度的定义和作用及其对发展的意义——兼论马克思的制度观与发展观[J]. 经济学家, 2015(04):21-28.
- [37] 范和生, 唐惠敏. “中等收入陷阱”, 本身就是理论陷阱?[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5(04):68-79.
- [38] 林志帆. “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吗?——基于增长收敛模型的识别方法[J]. 世界经济研究, 2014(11):10-15+22+87.
- [39] 贺大兴, 姚洋. 不平等、经济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J]. 当代经济科学, 2014, 36(05):1-9+124.
- [40] 都阳, 蔡昉, 屈小博, 程杰. 延续中国奇迹:从户籍制度改革中收获红利[J]. 经济研究, 2014, 49(08):4-13+78.
- [41] 丁一兵, 傅纓捷, 曹野. 融资约束、技术创新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的分析[J]. 产业经济研究, 2014(03):101-110.
- [42] 蔡昉, 王美艳. 中国面对的收入差距现实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4, 28(03):2-7.
- [43] 张林秀, 易红梅, 罗仁福, 刘承芳, 史耀疆, 斯科特·罗斯高. 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力资本根源:中国案例[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4, 28(03):8-18.
- [44] 秦佳, 李建民. 人口年龄结构、就业水平与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基于 29 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14(02):32-43+126.
- [45] 周敏, 林凯旋, 黄亚平.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J]. 现代城市研究, 2014(02):40-46.
- [46] 代法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经验和对策——基于 44 个国家的跨国实证分析[J]. 财经研究, 2014, 40(02):54-66.
- [47] 李稻葵.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路线图[J]. 经济研究, 2014, 49(01):23-25.
- [48] 郭金兴, 胡佩选, 牛牛. 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证据、理论逻辑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J]. 经济学动态, 2014(01):54-62.
- [49] 易绵阳. 近代中国两种金融监管制度的比较:基于交易费用视角的研究[J]. 财经研究, 2014, 40(01):116-124+144.
- [50] 张德荣.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J]. 经济研究, 2013, 48(09):17-29. [51] 杜曙光, 刘刚. “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再发现[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3, 34(05):29-36.

- [52] 江时学. “中等收入陷阱”:被“扩容”的概念[J]. 国际问题研究, 2013(02):122-131.
- [53] 朴馥永, 黄阳华. 以经济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自韩国的经验[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3(01):1-11.
- [54] 厉以宁. 论“中等收入陷阱”[J]. 经济学动态, 2012(12):4-6.
- [55] 李月, 周密.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文献综述[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2(09):64-72.
- [56] 邸玉娜, 李月.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分析——基于出口产品密度的视角[J]. 经济科学, 2012(04):35-48.
- [57] 龙莹.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动态变迁与收入两极分化:统计描述与测算[J]. 财贸研究, 2012, 23(02):92-99.
- [58]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 孙立平.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J]. 开放时代, 2012(03):125-145.
- [59] 李炳炎.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我国收入分配改革[J]. 管理学报, 2012, 25(01):45-50+108.
- [60] 蔡昉.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 经济学动态, 2011(12):4-9.
- [61] 马晓河.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观照和中国策略[J]. 改革, 2011(11):5-16.
- [62] 胡彦宇, 吴之雄.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经验分析[J]. 财经研究, 2011, 37(08):91-102.
- [63] 马晓河.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结构转型——国际经验教训与中国挑战[J]. 农村经济, 2011(04):3-10.
- [64] 王一鸣.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J]. 中国投资, 2011(03):24-29+9.
- [65] 郑秉文.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01):2-15+111.
- [66] 刘伟.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1, 12(01):4-11.
- [67] 胡鞍钢. “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J]. 人民论坛, 2010(19):10-12.
- [68] 高源. 中国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50位专家与6575名网友调查结果的对比分析[J]. 人民论坛, 2010(19):14-17.
- [69] 吴笛. 消费结构升级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基于域外国家的实证分析[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22, 43(11):68-72.
- [70] 林毅夫, 龚强. 发展战略与经济制度选择[J]. 管理世界, 2010(03):5-13+187.
- [71] 刘承礼.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 天津社会科

- 学, 2009(01):59-65.
- [72] 张五常. 新制度经济学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J]. 当代财经, 2008(07):5-9.
- [73] 蔡昉. 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8(01):13-18.
- [74] 林毅夫, 潘士远, 刘明兴. 技术选择、制度与经济发展[J]. 经济学(季刊), 2006(02):695-714.
- [75] 林毅夫, 胡葆森, 邹高禄, 尹成杰, 哈继铭, 杜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改革现行土地流转制度[J]. 城市开发, 2006(03):26-27.
- [76] 张旭昆. 制度的定义与分类[J]. 浙江社会科学, 2002(06):2-8.
- [77] 孙良. 新旧制度经济学的比较分析[J]. 中国经济问题, 2002(02):14-18.
- [78] 刘凤义. 威廉姆森谈新制度经济学[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2(01):93-95.
- [79] 青木昌彦, 周黎安, 王珊珊. 什么是制度?我们如何理解制度?[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0(06):28-38.
- [80] 林毅夫, 胡庄君. 中国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民的制度选择[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04):49-53.
- [81] 邵学峰, 任春杨. 中国自由贸易区外商投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优化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视角[J]. 经济纵横, 2016(11):38-42.
- [82]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05):614-620.
- [83] 连玉君, 廖俊平. 如何检验分组回归后的组间系数差异?[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17, 35(06):97-109.
- [84] 贾康, 苏京春. 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真问题——基于1962—2013年全球数据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判断、认识[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5, 19(04):51-63.
- [85] 张德荣, 朱翔宇.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问题——基于TFPG视角的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13, No. 267(02):93-102.
- [86] 黄凯南, 程臻宇.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前沿理论展望[J]. 南方经济, 2018, No. 350(11):15-26.
- [87] 温桂荣, 黄纪强, 邓署香. 有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策略[J].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2021, 37(07):102-109.
- [88] 黄新飞, 舒元, 徐裕敏. 制度距离与跨国收入差距[J]. 经济研究, 2013, 48(09):4-16.
- [89] 程强. 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制度与收入不平等[J]. 经济经纬, 2019, 36(02):118-125.

- [90] 陶长琪,彭永樟.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制度质量视角下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与路径选择[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35(07):3-21.
- [91] 张军扩,罗雨泽,宋荟柯.突破“制度高墙”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验分析与理论研究结合视角[J].管理世界,2019,35(11):1-7+71+230.
- [92] 夏勇,杨惠芳,于磊等.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制度质量视角下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与内在路径选择[J].西部金融,2021,No. 559(03):4-12+18.
- [93] 道格拉斯.C.诺思,张五常等著,罗仲伟译,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第一版,2003:2-7.
- [94] 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
- [95]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226.
- [96] 道格拉斯.C.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97]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39-140.
- [98]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87-89.
- [9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 [10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0.
- [1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0.
- [102] 徐贻军、何德平,制度的笼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
- [103] 林毅夫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82-398.
- [104] A.P.瑟尔沃,发展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07.
- [105] 道格拉斯-诺斯,路平,何玮.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05):5-10.
- [106] 查尔斯·I·琼斯:经济增长导论[M],舒元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36.
- [107] 叶飞文:要素投入与中国经济增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108] 张宇燕:“制度经济学:异端的见解”[A],《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6-228页.
- [109] Acemoglu, D. (2006). A simple model of inefficient institutions.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4), 515-546.

- [110] Acemoglu, D., Aghion, P. and Zilibotti, F. (2006). Distance to Frontier,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4(1), 37-74.
- [111] Acemoglu, D., Johnson, S., & Robinson, J. A.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 1369-1401.
- [112]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 Thaicharoen, Y. (2003). Institutional causes, macroeconomic symptoms: volatility, crises and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0(1), 49-123.
- [113] Acemoglu, D., Johnson, S., & Robinson, J. A. (2005). 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1, 385-472.
- [114] Agénor, Pierre-Richard and Otaviano Canuto. 2012. Middle Income Growth Trap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21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115] Agénor, Pierre-Richard and Otaviano Canuto. 2014. "Access to Finance, Product Innovation And Middle-Income Trap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767,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116] Agénor, P. R. & Canuto, O. (2015). Middle-Income Growth Traps. *Research in Economics*, 69(4), 641-660.
- [117] Agénor, Pierre-Richard (2017). Caught in the Middle? The economics of Middle - income trap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31(3), 771-791.
- [118] Aiyar, M. S., Duval, M. R. A., Puy, M. D., Wu, M. Y., & Zhang, M. L. (2013). Growth slowdowns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119] Aoki, M. (2011). The Five-Phas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China and Japan. ADBI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40.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120] Barro, R. J. (2016). 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 applied to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4(5), 5-19.
- [121] Bennett J, Chappell P, Reed H, et al. Trading places: the 'Commonwealth effect' revisited, Working Paper, 2010.
- [122] Binmore, K. (2010). Game theory and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8(3), 245-252.
- [123] Bloom, D. E., & Williamson, J. G. (1998).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2(3), 419-455.
- [124] Bogumił, Piotr and Rafał Wielądek. 2014. Securing Poland's Economic Success:

- A Good Time for Reforms. ECFIN Country Focus 10 (9), European Commission.
- [125] Bowles, S., & Polania-Reyes, S. (2012).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social preferences: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0(2), 368-425.
 - [126] Bulman, D., Eden, M., & Nguyen, H. (2017). Transitioning from low-income growth to high-income growth: is there a middle-income trap?.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22(1), 5-28.
 - [127] Chong, A., & Calderon, C. (2000). Causality and feedback between institutional measures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s & Politics*, 12(1), 69-81.
 - [128] Dabús, C., Tohmé, F. & Carabello, M. A. (2016). A Middle-income trap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Modeling the Argentinean Case. *Economic modeling*, 53, 436-444.
 - [129] Dingemans, A. (2016). Trying to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in Chile's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loring a way out of the middle - income trap through pragmatic export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34(5), 643-669.
 - [130] Egawa, Akio. 2013. Will Income Inequality Cause a Middle-Income Trap in Asia? Bruegel Working Paper 2013/06, October 9, 2013, Brussels, Belgium.
 - [131] Eichengreen, B. (2011). Escap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 I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Economic Policy Symposium Proceedings. Achieving Maximum Long-Run Growth, Kansa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 [132] Eichengreen, B., Park, D., & Shin, K. (2012). When fast-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sian Economic Papers*, 11(1), 42-87.
 - [133] Eichengreen, B., Park, D., & Shin, K. (2013). Growth slowdowns redux: New evidence on the middle-income trap (No. w1867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134] Fatas, A. and Mihov, I., 2009, Another Challenge to China's Growth,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7(3).
 - [135] Flaaen, Aaron, Ejaz Ghani and Saurabh Mishra. 2014. How to Avoid Middle-Income Traps? Evidence from Malaysi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427,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136] Fraser-Moleketi, Geraldine. 2015. The Next Ten Years of Africa's Economic Growth: What Does It Mean for Women? Keynote Address,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ddis Ababa, Ethiopia.

- [137] Felipe, J., Abdon, A., & Kumar, U. (2012). Track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What is it, who is in it, and wh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715).
- [138] Garrett, G. Globalization's Missing Middle[J]. *Foreign Affairs*, 2004,83(6):84-96.
- [139] Gill, I. S., Kharas, H. J., & Bhattasali, D. (2007).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 [140] Gill I, Kharas H. The middle-income trap turns ten.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5 Aug 26(7403).
- [141] Gill I, Kharas H & Bhattasali, D.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J].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7, 22(2):57-59.
- [142] Glawe, L., & Wagner, H. (2016). The middle-income trap: Definitions, theories and countries concerned—A literature survey.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58(4), 507-538. <https://doi.org/10.1057/s41294-016-0014-0>
- [143] Jimenez, Emmanuel, Vy Nguyen and Harry Patrinos. 2012. Stuck in the Middle?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alaysia and Thailand.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283,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144] Jitsuchon, S. (2012). Thailand in a Middle-income Trap. *TDRI Quarterly Review*, 27(2), 13–20.
- [145] Hadhek, Z., & Mrad, F. (2015). Trade openness,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European Journal of Economics,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75, 96-104.
- [146] Hamilton, Walton H., 1919,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 (1) :309-318.
- [147] Hausmann, R., & Klinger, B. (2006).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patter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128).
- [148] Hamilton, W. H. (1919).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economic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309-318.
- [149] Hamilton W.H, Institution, in Edwin R.A.Seligman and Alvin Johnson(eds) [M],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32 (8): 84-93。
- [150] Hodgson, G. M., & Knudsen, T. (2012). Agreeing on generalised Darwinism: a response to Pavel Pelikan.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2(1), 9-18.
- [151] Hodgson, G. M., & Knudsen, T. (2012). Agreeing on generalised Darwinism: a response to Pavel Pelikan.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2(1), 9-18.
- [152] Islam, Nazrul. 2014. Will Inequality Lead China to the Middle Income Trap?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9 (3): 398-437.

- [153] Jankowska, Anna, Arne Nagengast and Jose Ramon Perea. 2012. The Middle-Income Trap: Comparing Asian and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Policy Insights No.96, OECD, Paris.
- [154] Keefer, P., & Knack, S. (1997). Why don't poor countries catch up? A cross-national test of an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Economic inquiry*, 35(3), 590-602.
- [155] Kharas, H., & Kohli, H. (2011). What is the middle income trap, why do countries fall into it, and how can it be avoided?.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3(3), 281-289.
- [156] Knack, S., & Keefer, P. (1995).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ross-country tests using alternative institutional measures. *Economics & politics*, 7(3), 207-227.
- [157] Knack, S., & Keefer, P. (1997).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4), 1251-1288.
- [158] Koen, Vincent, Richard Herd and Sam Hill. 2013. China's March to Prosperity: Reforms to Avoid the Middle-Income Trap.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1093, OECD, Paris.
- [159] Kohli, H. S., Sharma, A., & Sood, A. (Eds.). (2011). *Asia 2050: 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 [160] Kumagai Satoru. 2011. "The Middle-Income Trap from the Viewpoint of Trade Structures." IDE Discussion Paper No. 482,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apan.
- [161] La Porta, R., Lopez - de - Silanes, F., Shleifer, A., & Vishny, R. W. (1997). 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 *The journal of finance*, 52(3), 1131-1150.
- [162]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 Vishny, R. W. (1998). 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6), 1113-1155.
- [163] Larson, G. M., Loayza, N., & Woolcock, M. (2016). The middle-income trap: myth or reality?. *World bank research and policy briefs*, (104230).
- [164] Mauro, P. (1995). Corruption and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3), 681-712.
- [165] Murmann, J. P., Knowledge, M., & Advantage, C. (2003). *The co-evolution of firms,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UP.
- [166] North, D.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 [167] North D.C.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68] O'Brien, D. P. (1976).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The Economic Journal*, 86(343), 619-621.
- [169] Ohno, Kenichi. 2009. Avoid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 Renovat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mulation in Vietnam.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26 (1): 25-43.
- [170] Razzaque M A, Vickers B, Ali S, et al. Commonwealth in the unfolding global trade landscape: Prospects, priorities, perspectives [M]. the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London, United Kingdom. 2015.pp.53-54.
- [171] Robertson, P. and Ye, L. 2013. On the Existence of a Middle Income Trap. *Economics Discussion/ Working Papers* 13-12,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172] Rutherford, M. (2001).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n and now.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5(3), 173-194.
- [173] Segura-Cayuela, R. (2006). Inefficient policies, inefficient institutions and trade. *Banco de Espana research paper* no. wp-0633.
- [174] Spence, Michael. 2011. *The Next Convergence.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Multispeed Worl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175] Vivarelli, M. 2014. Structural Change and Innovation as Exit Strategies from the Middle Income Trap. IZA Discussion Paper 8148,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Bonn, Germany.
- [176]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2013.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with Middle-Income Countrie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68/265, August 5.
- [177] Williamson, O. E.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s Academy for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Historical Research Reference in Entrepreneurship.
- [178] Williamson, O. E. (1996). *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79] Woo, W. T. (2012). China meets the middle-income trap: the large potholes in the road to catching-up.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10(4), 313-336.
- [180] Ye, L., & Robertson, P. E. (2016). On the existence of a middle - income trap. *Economic record*, 92(297), 173-189.

- [181] Yıldırım, A., & Gökalp, M. F. (2016).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A review o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 38, 347-359.
- [182] Yilmaz, Gokhan. 2014. Turkish Middle Income Trap and Less Skilled Human Capital. Working Papers 14/30, Research and Monetary Policy Department, Central Bank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Ankara.
- [183] Yusuf, S., & Nabeshima, K. (2009). Can Malaysia escape the middle-income trap? A strategy for Penang. A Strategy for Penang (June 1, 2009).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971).
- [183] Yusuf, S., and Nabeshima, K. (2006). *Postindustrial East Asian Cities: Innovation for Grow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